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十一期 ——
(二〇〇六年七月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607a)

【往事追忆】	四十年后看“十年”——鲁礼安的文革史	高伐林
【书刊评论】	对于文革，真相比结论更重要	方 方
【读书笔记】	历史是宗教 写作是拯救——读鲁礼安《仰天长啸—— 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	胡 平
【研究述评】	往事还要再提——英文回忆录中的文革记忆一瞥	伍 国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往事追忆】

四十年后看“十年”——鲁礼安的文革史

• 高伐林 •

面前穿着一身黑白粗格子外套的鲁礼安，不仅一头乌发，红光满面，而且走路大步流星，开言慷慨激昂，在街上若碰见，要说他三十出头也有人信，然而实际上他却年近花甲，而且，他还蹲了 11 年半大狱，绝大多数日子被单独监禁。

他的一位老友告诉我，前几个月女作家方方见到鲁礼安第一句话，竟也是一模一样的大出意外：“你这么年轻！”

方方写了一篇文章《一个人的文革史》，就是眼前鲁礼安的“文革”回忆专著的序。他将这本 50 万字的沉甸甸的书递给我——《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

◇ “请给我以火”

书名“仰天长啸”，出自岳飞的《满江红》。鲁礼安回忆说，母亲教的歌中自己最爱引吭高

歌的就是这首《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那份壮士情怀，让少年鲁礼安热血沸腾，憧憬着长大后也要为国赴汤蹈火，建功立业。

春去秋来，多少次他重新咀嚼这四个字、这一首词：“三十功名尘与土”在哪里？“八千里路云和月”在哪里？难道真只能落得“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鲁礼安在入狱第八年的除夕深夜，跪在铁窗内发下誓言：今生今世，只要能活着走出这口活棺材，就要说出这桩大冤案的真相。虽然漫长的狱中岁月毁灭了把自己造就为国家栋梁之材的梦想，“但活埋在地底多年，经受了巨大苦难的煎熬与磨练，我可以成为一块煤、一块能燃烧的煤。用煤的火焰去洞照那一段暗无天日的历史，让后人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曾经遭受过怎样惨烈的苦难”！

“成为一块煤”——这让我们记起艾青、郭沫若、叶文福那些自比为煤，渴望燃烧的诗。鲁礼安在第一章中，引用的正是艾青的问答名句：“你已死在过深的怨愤里了么？……不、不，我还活着；请给我以火，请给我以火。”

发誓要说，是一回事，怎么说，则又是一回事。他在“文革”中有“武汉第一笔杆子”之誉，铺开了纸，却无法落笔。鲁礼安告诉多维记者，过去的岁月一闭上眼睛就万象纷呈，但从哪里说起却茫无头绪，“最后我想到捷克作家《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开头，这就一下子抽出了线头，千言万语如同开了闸般喷薄而出，一泻千里，写得畅快极了！”

“从门到窗子是七步，从窗子到门是七步”，捷克作家伏契克描写庞格拉茨盖世太保监狱牢房的这句话，我十岁时就从姐姐学的初中《文学》课本中读到过。

后来，命运安排我自己来阅读监狱这部“大书”，在这本书里我又读到了这句话——我所在的囚室，从门到窗子，不多不少也恰好是七步。

七步，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中，实在是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人还需要经过多少世纪才能洞察一切呢？”伏契克在他写的那本名叫《绞刑架下的报告》的书中问道：“在人类走向进步的路上已经经历了几千座牢房，还要再经历几千座牢房呢？”……

这间铺着木头地板七步来回的斗室，足够我思考各种问题。何况思想是不受空间限制的，思想可以冲破牢笼……（摘自《仰天长啸》）

◇ 两种“文革”，三个阶段

鲁礼安在“文革”中是一个“造反派”。《仰天长啸》的上卷12章，主要回忆两年“造反”的经历；下卷12章，主要记叙11年为“造反”所受的惩罚和对“造反”的反省。

“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在《造反派与三种人》一文中说过：对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恐怕‘造反派’已经成了文革罪孽的两个最重要的集体记忆之一：上层是‘四人帮’，下层则是‘造反派’。在某种程度上，造反派成了诬陷、阴谋和暴力的抽象代名词，承担着文革中所有罪恶的大半责任”。

人们习惯了说“十年浩劫”，其实，“十年”并非一以贯之，也不是“浩劫”两字就能一言以蔽之，而有多条线索复杂交织、回转起伏。不少学者、作家不断深化扩展“两个文革”的看

法，即将毛泽东的“文革”和民众的“文革”分开来判断是非功罪，毛泽东鼓动民众造反夺权的目的，与民众自身诉求，语言虽相同或相似，内涵并不一致——在高层，是夺领导权，在底层，是夺生存权。

有学者（例如姜弘）这么划分“文革”的阶段：

一开始近半年时间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有特权的“红五类”制造“红色恐怖”时期；中间不到两年，是多年来受压的弱势群体起来为不受迫害，争取权利的时期——这就是“造反派”时期，他们崭露头角是在1966年9月底毛泽东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主要“业绩”不是“破四旧”“抄家”，而是“炮打司令部”，造省市的反；1968年后，“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是上层继续进行权力斗争并联手镇压“造反派”的时期。到1969年初中共“九大”前后，“造反派”群体退出社会舞台。

“文革”中最骇人听闻的暴行血案，恰恰主要发生在前后两段，而并非中间“造反派”红火的这一段。当然，“造反派”也并非清白无瑕，某些组织、某些个人参与迫害，对打人甚至打死人有不容推卸的责任。

◇ 不安分的基因被毛泽东激活

鲁礼安的故事正是“造反派”命运的缩影。这支“笔杆子”名不虚传，在七千字的第一章中，就信手拈来古希腊犬儒学派、布利丹笔下驴子、“能思想的苇草”、但丁、雪莱、曹植、泰戈尔的诗等十多个典故，与自己的记事抒情浑然一体，充分展现他厚实的修养和敏捷的才思。但他就像一颗一纵即逝的彗星，光华炫目仅仅一年半。

鲁礼安出生于1946年初冬。内战烽烟乍起，中国希望的曙光忽然暗淡，还在襁褓里的他，却听熟了母亲自弹自唱对主耶稣的赞美：“平安夜，圣善夜，万暗中，光华射……”父母给他姐姐取名，用了“平安夜”的“平”，给他则用了个“安”字，寄托了这一对虔诚基督徒在天翻地覆的年代，祈求上帝保佑小姐弟一生平安的心愿。

1965年，鲁礼安从中学毕业，受影片《甲午风云》影响，考进华中工学院水下舰艇专业。进大学还不到一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既然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大革命，是“反修防修”、“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触及人的灵魂”的大革命，他和千百万青少年一起义无反顾、全心投入。

1966年从夏天到秋天，伴随着一句句“造反有理”、“炮打司令部”的最高指示，这些年轻学生宛如坐上了过山车，忽一下直冲云霄，忽一下又飞跌深渊。工作组来了；工作组撤走了；“红卫兵”造反了；华工党委书记朱九思与各系领导都被“揪”出来监督劳动、挨斗请罪；又一批学生成立“造反派”组织，造红卫兵要保的“走资派”的反……

鲁礼安身上不安分的基因激活了，第一次是跳上辩论台向取代校党委的工作组放了一炮：运动大方向没把准，在普通群众中大抓坏人；工作组长还要学生用三天学习毛主席“老三篇”，改造好世界观再投入运动——三天改造好世界观，“那不是活见鬼吗？”这最后一句话，引起全场好一阵喧嚣。

真正让他一夜成名的，是一张批判代理省委书记兼省长张体学的大字报。工作组撤走了，对工作组功罪的辩论方兴未艾。张体学来到各校巡回演讲：省委派工作组犯了压制群众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保工作组和反工作组的两派师生之间的冲突嘛，则是场误会。这种说法让誓不

两立的对立群众皆大欢喜，但被工作组划为“中间偏右”的鲁礼安，却从中嗅出违反中央关于“文革”决定《十六条》的气味：《十六条》说，“一个要革，一个要保，这是关系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重大原则分歧”，怎么能说成友军“误会战”呢？他连夜写出大字报《省委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大暴露》，同窗好友谁也没胆量共同署名，鲁礼安只好只署自己的名字，拂晓前贴到学院最显眼位置。天亮时，这张大字报前观众里三层外三层，都在谈论这个署名船舶系一年级6556班学生鲁礼安的“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互相在打听谁是鲁礼安？“老实说我那会儿得意极了，飘飘然不知道自己的骨头的份量”。

随后他声援陷于孤立的北京南下串联的学生造省委反的一张大字报，更使他的名气越出校园，扩展到社会上。

王任重当年有句对付不安分学生的话：“枪打出头鸟。”鲁礼安尝到了当“出头鸟”的滋味：领到的“红卫兵”袖章被收回；被查三代档案，大字报和传单无中生有地诽谤其父在抗日战争时期“跟随汪精卫，投降日寇，当了汉奸，于1942年加入汪记国民党”，其母“成了基督教徒，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反华的应声虫”，与他父亲是“同样的货色，同时加入汪记国民党”。鲁礼安本人自然也就是“汪伪汉奸的孝子贤孙”，“妄图在武汉一哄而起，推翻湖北省委，追至中南局，直指党中央，达到复辟国民党统治的罪恶目的”。

鲁礼安的造反害得父母家被抄了三次。第一次是他所在的华中“红卫兵”干的，他回家见满地都是书籍、纸片和横七竖八的衣物、踩碎的镜框、打破的玻璃杯，一片狼藉，惨不忍睹；次日他母亲学校的老师也戴着红袖章来抄家，这些半老女同胞只对首饰感兴趣，抄走金项链一条、父母结婚戒指一枚；第三天他家所在的街道的“积极分子”也来清“四旧”，将凡值钱一点的衣物搜刮一空……

红卫兵组织被“红五类”垄断的局面被打破后，武汉地区学校的“少数派”红卫兵组织逐渐形成共同名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区别于被其蔑称为“三字兵”的“保皇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兴起，伴随着一系列“造反事件”：在各院校抢夺“黑材料”（工作组为对学生“秋后算帐”而整理的秘密材料、将学生划为左右的“黑名单”）、抢占学校广播站……而充满造反精神的鲁礼安，因出身不硬，竟不得其门而入；连他要参加步行串联“长征队”，都是在他破指写下血书之后，才被开恩批准。

◇ “敢死队”先锋到太岁头上动土

鲁礼安在“文革”初期的“造反”行动都是小试牛刀。他成为“造反派”一翼的领军人物，或说一种思潮的代表，还是在1967年所谓“一月革命”风暴之后。

当时“造反派”群众组织如雨后蘑菇一样冒了出来，在权力和财产再分配中“兄弟阋于墙”，争功争名，不可开交。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等十来个组织，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声明，攻击其它造反组织是“托派”和“湖北黑省委第五纵队”，引发了“造反派”内部一场空前大混战。对“造反派”早已忍无可忍的武汉军区宣布工总为“反革命组织”，勒令解散，抓了分部以上头目近500人。

塞满犯人的军车在江城夜空呼啸奔驰，震惊了好不容易才被批准加入“造反派”组织、在《新华工报》当编辑的鲁礼安。他奋笔疾书一篇篇文章，借巴黎公社的启示，要求“正确看待造反派的功过”。不仅如此，“我素有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再次发作。太岁头上也敢动土”，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也敢怀疑。当时中共中央转发了毛“三七指示”，肯定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做法。鲁礼安质疑说：延安中学上报的材料称学生“仅用一天就

实现了全校大联合”，可能吗？短短一天能消弭由于政见不同而导致的思想分歧、精神隔膜和相互仇视的情绪？他断定这是假的，是有人炮制了“抽掉两条路线斗争实质的大毒草”欺骗伟大领袖。大字报贴了出去，立即遭到攻击——矛头指向红太阳！他辩解说自己是指有人编造假材料“欺骗”毛主席——那也不行，伟大领袖从来都明察秋毫！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又捅了一个更大的乱子。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派出几十个小分队，到各地从档案中挖出成千上万“叛徒”，中共中央印发毛泽东批转的《薄一波、刘澜涛等六十一人自首叛变材料》，称他们接受刘少奇、张闻天的“中央指示”自首出狱，窃据要职，是“党内一大隐患”。而鲁礼安研究了这份材料后，断定实属一大冤案，写了篇文章，称“抓叛徒”背后有大阴谋——这又犯了大忌！他被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开除。

到底是时代不同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处不留爷，自己拉队伍。他与冯天艾一块拉起了大、中学生二十多人的“新华工敢死队”。鲁礼安解释：“敢死队”不是鼓吹武斗不怕死，是取为革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之意，是用文字向“反动路线”宣战，打砸抢与我们无缘。鲁礼安本人在“文革”中更自始至终“君子动口不动手”，一直沉浸在逻辑和激情的乐趣之中。他们以一篇《敢死队向武汉部队支左办公室一小撮混蛋挑战》的大字报亮相，历数武汉部队如何“支保不支左”，“镇压革命造反派”，情绪激昂，语言尖锐：“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今日雄文四卷在手，何日缚住武汉谭震林游街示众？！”鲁礼安对多维记者自嘲：“这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癞蛤蟆打哈欠的文风”。

大字报激怒了武汉军区首长，“敢死队”还参与支援黄石市造反派逼迫武汉部队韩东山副司令员检讨的行动，军区签发了对他的“逮捕令”，不知为何却没有动手。

“敢死队”更重大的行动，是为被军区镇压的“工总”翻案。鲁礼安认为：造反派头头中或许不良分子，但个人品质对整个组织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这个组织在革命中所处地位如何。拥有数十万产业工人的工总，在武汉地区“文革”中举足轻重。他写下《从阿基米德的一句话谈起》等三篇翻案文章。

鲁礼安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们真正以为我们投身的，是一场反修防修，保证中国永不变色的史无前例的“圣战”。“苍天在上，在为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弱小者说话这一点上，我敢说我问心无愧。”

◇ 从狂热呐喊转向冷静思考

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营垒，终于从“批判的武器”转向了“武器的批判”，互相诉诸武力。保守派组织联盟“百万雄师”在部队支持下，控制了多数工厂，将这些工厂的造反派驱赶到市中心几个据点，不断对这些据点进行武力攻击，所幸当时的武斗还只是用冷兵器——长矛、棍棒。鲁礼安也鼓吹“文攻武卫有理”。他在大会上演说：“当反革命对革命人民无情杀戮的时候，难道我们竟愚蠢到递过脖子去任人砍杀，而不是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去武装自卫，坚决抗暴吗？”但当台下响起暴风雨般掌声，有人喊“文攻武卫万岁”时，他话锋一转：“我并不赞成文攻武卫万岁。这个口号，也只能说是在当前这样一种特定形势下，一个不得已的应变口号。”他鼓吹应当“发扬优势”，优势就是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去唤起群众……“几乎我的每一句话都被狂热的掌声和欢呼声打断……使我产生出一种幻觉”，“仿佛自己正站在硝烟弥漫的街垒中，对浴血奋战的武装群众进行动员演说”。

在保守派“百万雄师”酝酿向所有造反派据点发起总攻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谢富治及王

力等人相继来到武汉处理危机。谢、王在公开场合露面，认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工总被捕的骨干陆续放了出来。“百万雄师”并不知道毛、周就在武汉，眼看政治风向要变，决定一不做二不休，以批谢、王“下车伊始偏听偏信”为名，发起超大规模示威，逼迫中央改口。1967年7月20日，骇人的政治风暴拔地而起：几百、上千辆卡车满载“百万雄师”、“公检法”和解放军8201部队战士，在三镇武装游行，其声势之浩大为建国以来所罕见。他们不仅在多处暴打“造反派”，还冲击、包围军区抓王力，形同一场“叛乱”。

鲁礼安在这场事件中差点丧命。他带上一部照像机，上街抓拍“百万雄师”成百上千武斗队员头戴柳藤帽、手持长矛冲击湖北大学等血腥场景。但他被对方发现了，鲁礼安拔腿就跑，身后几名“柳藤帽”挥舞长矛紧追不舍，他慌不择路，跑到长江大桥引桥旁陡崖上，一咬牙闭上眼睛抱紧相机，滚下几丈高的陡崖，相机摔得四分五裂，他也摔成重伤，幸亏逃过了武斗队员的毒手！

毛泽东、谢富治及王力都脱险了，中央公开表态，武汉形势急转直下，“百万雄师”垮台，“造反派”群众上街载歌载舞狂欢。鲁礼安为工总翻案有功，被“工人运动领袖”奉为座上客。但他有一种预感，“造反派”同室操戈将再现。一个事实也使他特别不安：重新掌权的“造反派”对前“保守派”群众残酷报复，私设公堂，严刑拷打。他在回忆录中说“据不完全统计，单武汉一地保守派方面被打伤打残的，就多达六万多人，被打死的有六百多”。

北京有人点名他去人民日报社“任立新写作小组”。据说这个写作班子由北京一些红卫兵笔杆子组成，直接听命于“中央文革小组”，但商调函被卡在华工造反组织一号头头张立国的口袋里，他没去成。幸亏没去成——听说“任立新写作小组”和不久就因发表乱军讲话而垮台的王力很有关系。

“‘文革’将把中国、世界引至何处”的这类大课题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他和同伴感到实在太欠缺知识，便空前勤奋地读书：马列著作，费尔巴哈、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还有《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史》和约翰·里德关于十月革命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后来又增添了《第三帝国的兴亡》，戴高乐《战争回忆录》、托洛茨基《第四国际》……鲁礼安说：说来脸红，书都是我们从我们借住的省委干校图书馆、长江日报社图书室偷的。

鲁礼安在这段时间也写了大量后来为之惭愧不已的文章。他写了《论武汉工运道路》，文中关于“以钢工总为核心，实现武汉地区的革命大联合”的提法，带有明显派性。后来他反省说：不少“大权在握的造反派头头，其实并不具备担当‘核心’的素质”。

他支持一支农民队伍——浠水“巴河一司”进城造反。这支队伍的负责人王仁舟，是北京外语学院因政治言论“文革”前被开除、“文革”中又被平反的学生。王宣称贫下中农“才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因为他们“经济地位最低、生活最苦”“所以最迫切要求改变现状”。鲁礼安并不相信他这一套怪论，他懂得判断一个阶级进步与否，主要是看是否与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联系，但他去考察他们比人民公社更“一大二公”的“新农村”，撰写《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大加称赞这些所谓创举乃“共产主义的萌芽”，认为“巴河一司”的崛起是中国农民运动高潮将要来临的预兆。他在回忆录中承认：我不懂得王仁舟这些“革命创举”其实早在“大跃进”时期，就被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过，曾经将中国农村推向深渊。

◇ “我一生的根本任务是制造真理的旗舰”

鲁礼安从运动一开始就对山呼万岁、万寿无疆之类有一种本能的反感，“或许是出于天性的缘故吧”。他不仅对“忠字歌”难以适应，也从来不戴毛泽东像章。特立独行的鲁礼安通读《毛

泽东选集》，将毛在一些问题上的论述与后来的实际情况相对照，认为即便是毛主席这样的伟大人物，也常有认识超出了实践或落后于实践的问题，用毛自己的话说，就是也会犯“左”或“右”的错误。他在毛着上一些地方作眉批说，现在看来这里“左”了，现在看来这里“右”了。这在旁人眼里实属大逆不道，但他自己却浑然不觉。

“文革”激烈动荡了一年多，武斗不断，内乱不止。有个朋友建议鲁解散“敢死队”，另行组织一个学习马列主义团体，聚集起真正有头脑、有思想、能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战友，学习毛主席著作——不但要学习已经公开出版发行的，而且要研究未公开出版的，包括毛的早期著作，独立思考这场革命的来龙去脉。鲁礼安万分感谢北京一些学生组织编印上下两册《毛泽东思想万岁》，收入一大批毛的早期文稿，给他展示了大量以前从未知晓过的思想和信息。毛泽东这位从韶山冲走出来，曾想当警察、当法官、当肥皂制造商的青年学子，原来并非生来就一贯正确的“完人”啊！

他们决定成立“北斗星学会”。名称由当时一句著名歌词“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而来，推选冯天艾为会长，冯提出学会须有一份自己的刊物，不是有过《湘江评论》吗？我们的就叫《扬子江评论》好了。

鲁几乎未作任何修改，一气呵成了《北斗星学会创立宣言》的草稿。劈头就说：“我们试看矿岩的分布，铁矿煤矿和云母，各自云集在一起。这是自然界千百万年变化的结果，是大自然的威力；且看我们的队伍，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废、有人叛变，但更有人集结在一起，奋勇地前行。这是一年多来运动的结果，是大革命的威力，这种威力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最后一句是：“北斗，北斗，未来几十年的中国、世界，将谁主沉浮！”

或许有人会感到这些文字狂气十足？那个年代的青年学生都时兴这种带狂气的文风。鲁礼安在一本“文革”日记的“序言”中还声称“真理的军舰是我的旗舰，我一生的根本任务是制造这艘旗舰。人们都在匆匆忙忙地制造自己的划子……我和我的同伴们则要制造真理的军舰去征服思想的海洋”呢！

◇ “北斗星学会”运交华盖

“北斗星学会”特意选在十月革命六十周年——1967年11月7日成立。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作家、十多年后写出《苦恋》的白桦和剧作家所云平，中学代课教师、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张志扬与童丹等人都来了。诞生之日却似乎运交华盖，当场有位工人代表尖锐批判鲁的宣言草稿，更有一个武汉警备区的人不请自来，默不作声，一个劲地记录每个人发言，弄得人心里发毛。不少与会者打退堂鼓，只剩下六七个人算是成员。“那天散会后与我们一道合影留念的人倒不少，而这张照片从照相馆洗印出来后，不知怎的竟也有张落到了警备区的手里，成了长官们按图索骥、追查‘危险份子’的好证据。”

后来工总一个基层头头告诉鲁：武汉军区首长接到警备区的密报后，立即命令对参加学会成立仪式的所有人进行秘密调查，这位头头就被要求调查其中一名工人。鲁礼安纳闷：“文革”各种群众组织何止成千上万，各个群众组织之间打破了头，都不觉有什么稀罕，为什么偏偏我们几个阅历不深的学生想组织起来学习理论研究“文革”，就犯了大忌？

近一个月后，在省革委会12月4日常委会上，武汉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一把手曾思玉点了“北斗星学会”的名，称之为“稀奇古怪的组织”，“老右派分子”白桦也出席他们成立仪式。曾思玉一边抖动手中的一张纸一边说：这就是这个北斗星学会的宣言。这个宣言非常反动，每一个字都是反动的！

首长的表态如此横蛮、如此不负责任，是鲁礼安始料不及的。学会几个成员也都惴惴不安。不久有消息说，北京、上海的类似学会的日子都很不好过。看来无论用什么名义，只要企图在思想理论上作自主研究，你就是心怀不轨。他感到憋气：为什么偏偏生活在这个把人当做“神”来供奉的环境里？我们从造旧世界、旧观念的反起家，为什么又沦为新的精神奴隶？

怎么办？一位叫周凝淳的朋友向不甘寂寞的鲁礼安说，毛泽东不久前发出“最高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何不就此“决心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命名？名称太长，就简称“决派”——搞个“决派联络站”，联络一批志同道合者完成学会未竟之事，出版《扬子江评论》。

周凝淳转述张志扬、童丹的看法说：这是一个不容许有自由思想存在的时代，但是“大民主”又确实给了某种言论自由的契机，而言论是思想的外壳，就看你怎么表达。

已经十分娴熟于起草宣言的鲁礼安，便又起草《决派宣言》。第一稿所谓“以最大的热忱准备迎接中国农民运动高潮的到来”因“巴河一司”这时彻底失败而成了废话，年轻学生希望他重写，对夺权后“文革”运动的走向作出分析、预测：既然“革命委员会”仅仅是“临时权力机构”，那么由什么样的正式权力机构取而代之呢？

鲁礼安在《决派宣言》新稿中指出：“革委会”最终会被“革命群众”淘汰出历史舞台，但还没有明确提出将被一种什么样的新国家形式来取代。

就在鲁礼安苦思苦想“文革”前景的同时，天南海北都有一批人正在探索同样的问题。有一天广州美术学院学生李正天登门造访，鲁礼安与他一见如故，相识恨晚。六年之后，李与另两位广州青年化名“李一哲”合写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思考》，闻名全国。而在浩浩洞庭湖的那一边，湖南“省无联”中的一些独立思考者，在一篇《我们的纲领》文章中，也提出湖南“省革筹”实际上是旧政权的翻版，对之必须实行“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一位名叫杨曦光的中学生（后来他改名杨小凯），则在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中认定，“现在90%以上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他们与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主张“推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革委会的统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

当年知识青年比起他们的前辈来，拥有的精神资源是十分可怜的。1957年那一批“右派”多半经受过“五四”的洗礼，拥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人权思想等人类精神资源，而鲁礼安这个年龄的青年是在中共的思想专制环境下成长，“文革”前夕他们手中只有“毛主席语录”和《雷锋日记》。鲁礼安与“省无联”以及其它地方独立思考的青年，拥有高度相似的思想演进轨迹：从官方的毛泽东思想，到非官方版的毛泽东思想，到列宁、马克思，到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和理论，然后反过来质疑现存制度，去探索新的道路。他们不约而同地高度关注1871年的巴黎公社。鲁礼安就反复鼓吹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公社国家，他的观点的支柱，就是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中所主张的：对一切公职人员实行全面选举，把他们的薪金降到普通工人收入的水平。公职人员都要对选民负责，不享有任何的特权，选民随时监督、随时撤换。

鲁礼安和战友尽管造反夺权有功，但是由于他们勤于学习、思考，思想逐渐超前，与“造反派”的主流日益分道扬镳，成为边缘化的偏师。鲁礼安回忆那时他的处境说，华工“造反派”内部争权夺利日益激烈化和表面化，但在坚决不让原院党委书记朱九思重新上台这一点上又结成同盟。而他不单主张解放朱九思，而且认为中央邓小平、省里张体学，也都应当重新启用，

这使造反派头头们对他甚为疑忌。

风声越来越紧：康生等人指湖南“省无联”为“反革命组织”，组织被取缔、思潮被批判、成员被逮捕。当局杀鸡吓猴，让鲁礼安他们感到险象环生。在有经验的朋友劝告下，鲁礼安决定不以鸡蛋碰石头，紧急召集骨干分子开会，提出解散“决派联络站”。没想到他那些观点比他更激进的部下坚决不肯。鲁礼安只好以“七二〇事件”中自己跳桥受伤复发须治疗为由，退出决派活动。

对他的围猎在逐渐收网了。省革委会和军区无端怀疑是鲁礼安在幕后操纵各地武斗，指示华工革委会要从他这里挖罪证。有天半夜，他突然被拘押、隔离反省，给他纸笔，要他交待。他根本不理睬他们，只在纸上信笔写写画画。但他的笔记和日记都被抄查，他在毛选上的眉批令他们如获至宝——白纸黑字啊！他们整出了一份分门别类列举他反对毛主席等罪行的材料。

这次被鲁礼安侥幸逃脱，还一口气写下三篇总题为《我回答你们》的文章，逐一驳斥对他的指控。他鄙视那些喋喋不休地指责他离经叛道的人，他讥笑他们困在围墙之内坐井观天，只知道头上有个“红太阳”，忘记了无边无际的天空中还有数不清的恒星。鲁礼安却没有料到，这“围墙”不是别的，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铜墙铁壁”！

1968年5月16日，《扬子江评论》的创刊号印出来了。刊出了鲁礼安起草的文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派》。他模仿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派》，抓住毛泽东“对派性要作分析”一语，抨击上海对革命造反派学生的反攻倒算——他对镇压过上海“红革委”的张春桥特别不满，也非议周恩来“一贯采取调和路线”，但是他尊敬周鞠躬尽瘁，坚持不点周的名。鲁礼安后来承认这篇文章本身就是站在“极左路线”立场，“流毒甚广”。

鲁礼安在文中还宣称“一旦资产阶级首先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就必须用暴力对付暴力，用革命的战争来反对反革命的战争”。在这个问题上，鲁礼安的感性与理性是分裂的。当他目睹“七二〇”前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七二〇”后造反派内部所谓“钢派”与“新派”之间一场场血腥武斗，曾经和正在夺去多少无辜群众的生命，不由得心情沉重，想到那些“为捍卫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而横尸街头的同学，那些被流弹或走火误杀的同胞，他们死得“比泰山还重”么？九泉之下真的能安详合眼么？“我写的那些鼓吹武斗的文章，究竟是在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摇旗呐喊，还是在为一种骨肉相残的罪恶推波助澜？”

他在监狱中无数次扪心自问，对自己的文字认真反省。他对多维记者说：我长期认为“两条路线的斗争”最终战争不可避免，“七二〇”后甚至鼓吹“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形式仍然是武装夺取政权”，流毒之剧，影响之坏，怎样估计都不为过分。我写这种文章，等于是唯恐天下不乱！还有鼓吹派性，宣传“农民领袖”王仁舟的极左蓝图……我那些尖锐刻薄极富煽动性的文字，也不可能不对某些人造成相当的伤害。

这篇文章是鲁礼安“文革”中的“绝笔”。两天之后，他在赴黄石途中于铁山被劫，从此从人间消失。

鲁礼安说：如果我不是在1968年的夏天失去人身自由，以我狂热激进的思想方式，在以后的年代里是会沦为“四人帮”的爪牙，还是像杨小凯、李正天那样，从狂热走向冷静、从幼稚走向成熟、从狭隘的派性走向为整个民族的利益和社会的进步而斗争？我想我一定会走向后者。无它，只是因为我从来嫉恶如仇，崇尚正义，我不但有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头脑，且不乏探索真理，为真理献身的勇气。但是历史没有给予我走向真正觉醒的时间。

1968年5月17日深夜，武汉地区“文革”造反派的“一枝笔”鲁礼安，在前往黄石的途中在铁山被劫，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1年多的单监生涯。被劫是偶然的——误闯了对立派系的哨卡；被囚却是必然的——毛泽东发动“文革”放妖容易收妖难，桀骜难驯的鲁礼安这时赶上了毛泽东从“大乱”达到“大治”的转折点，正好用来杀一儆百。

鲁礼安被抓在武汉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数百个群众组织参加“营救鲁礼安”行动，数万人乘坐三百多辆卡车示威游行，甚至还有人企图“劫法场”。但最后都被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强行镇压下去。

◇ 入狱

鲁礼安对多维记者没有多谈自己在监禁中的遭遇，但是他的《仰天长啸》中却记录了他亲身遭遇的暴行。仅举几段：

四五个大汉凶神恶煞地围紧了我。我身手全被绑着，躲无可躲、防不胜防，只能给打手们充练习拳头的“沙包”……那家伙霍地从屁股后摸出把雪亮的匕首，“老子今天非把你这小子一块一块零刮了，”他边说边揪住我的左耳，朝耳根上就是一下。我只感到耳根剧痛，鲜血汩汩地顺着脖子朝下流——这是他被劫时给他的下马威。

我被押到地下约200米深处的矿井工棚，两个中学生一人抓起一根用钢丝绞成的鞭子，朝我狠狠地抽下来。一道鞭子一道血印，我痛得蜷缩在地下，一边用戴着铐子的手护头，一边大声惨叫……每天都免不了这样一顿毒打。我被打翻在地上，他们就用脚上的靴子踢我——这是在受审讯的日子。

他被当兵的铐成“苏秦背剑”——将一条胳膊从肩上扭到背后，另一条胳膊从腰下扭到背后，然后用带铜扣的皮带朝头上猛抽，逼他承认“组织越狱”；他被看守班长用半自动步枪上的三棱刺刀朝胸口猛捅，痛得在地下打滚……

当局开始想给他定“恶攻罪”，但这条罪名实在莫须有；后又捏造出“北决扬反革命地下组织案”，1969年9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发（69）67号文件”“对武汉问题的指示”说：

（二）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在武汉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的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歪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

（三）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的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

审讯人员说，因为他经人介绍曾去拜访过一次老红军王盛荣，所以王就算成他的幕后黑手；王盛荣又是中共党史上王明那一伙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王明跑到苏联，还炮制文章恶毒攻击毛泽东和“文革”，所以当局就把鲁礼安与王明挂上了钩——令鲁礼安叹服：“真不愧是惊天动地的大手笔”！

据三十年后官方《武汉大典》记载，当时“全市被定性为五一六、北决扬的多达数万人”，为此受到清查的更是不计其数，据估计达数十万之众。

被关在单人囚室中，他曾经狂暴抗争，激烈申辩，用头撞囚室的围墙，想拉断囚笼的铁槛，想用铁片切开血管，还用一根旧裤带上吊，裤带却崩断……他的同案犯中先后关疯了四个。

支撑他好好活下去的力量之一，是他渐渐恢复了对自己的信心：我无罪，他们才有罪。鲁礼安争取到读书的权利，通读《辞源》，苦念英语，钻研《史记》……还背着看守断断续续用极小字体，写下五六万字的纪实小说《狂飙曲——红卫兵之歌》。“本来想写成正剧，写着写着就不像了，写成了搞笑的荒诞剧”。

就在“文革”结束之后两三年了，他还差点被判死刑，后来又改为无期徒刑。原定是要开公判大会，主会场就设在武汉剧院。省里把判决情况上报中央备案，以为铁板钉钉，遂印刷判决通告。岂料中央管政法的一位负责人调阅案卷，认为当年对“北决扬”一案的处理有问题，遂报中央政治局讨论，终于否定了1969年中央“九二七”指示，传达到湖北省委。而当时公判大会已一切就绪，正准备到监狱提鲁礼安一行人犯押往主会场……

◇ 出狱

大墙之外，天地翻覆，真理标准讨论的劲风终于吹开了思想专制的堡垒。1979年10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向湖北省委呈送《关于处理“北、决、扬”一案的请示报告》说：“作为认定‘北、决、扬’反革命组织主要依据即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事实已不存在，而且公开发表的‘决派’宣言不能认定为反动纲领，因此‘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12月，省委批覆同意这个报告。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终于给了他一纸刑事判决书：“免于鲁礼安刑事处罚。”

他说：我既然能够咬着牙挺过来，我就是胜利者，身后的监狱之门，便是我的凯旋门！

走出了牢狱的监禁，走不出社会的禁锢，连大批知青都难找工作呢，何况他这个已经33岁的“文革”造反派头头、释放犯！他打短工、拖板车、踩三轮、代课……一度还动了考研的念头，但他怎么过得了“政审”这一关？

幸亏当时还有“顶职”这一政策。他父亲从阳逻船厂退休，鲁礼安顶替进了厂当仓库保管员，后来调厂人事科搞职工教育，对青年工人进行文化补习，工人们称他是“鲁老师”。

他的母校华中工学院给他补发了本科毕业文凭，他又完成了电大汉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业，撰写了一批论文，创造了一套历史网络教学模型，编写了一套地理形象趣味教材……他讲课很受欢迎，武汉市所大学想调他，让他试讲过几堂汉语文学课，但是最终没有能调成，原因之一，还是“文革”问题留的尾巴。加上当时还遇到一些别的不公正的事儿，让鲁礼安心里凉了半截，索性停薪留职，返回武汉。满怀抱负的鲁礼安，被自己的沉重过去拖曳着，总觉得自己的才华和精力没能施展。

当鲁礼安是“文革”造反闯将名震江城之际，颇引动一些姑娘的芳心，他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之余，也对心仪的女孩萌生过情愫。被关进黑牢，自然就什么都谈不上了。出狱之后“释放犯”的帽子又吓退了多少姑娘！据说有个女孩看上了他的才华，一到公安部门去打听，吓得花容失色：公安局的人说，这个鲁礼安是个“大反革命”，坐了十几年牢，差点给枪毙！

然而，终究有能慧眼识珠而不信邪的姑娘。一个在供电局工作、比他年轻十来岁的重庆女知青，得知了他的传奇故事。她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大不了——“文革”中为几篇文章坐牢，又不是杀人放火！她与他见面，终于结成良缘，生了一个儿子。

1989年一个偶然的机，鲁礼安认识了一位英籍犹太商人，应聘成了这位商人驻汉办事处雇员。当地工商部门说：鲁有“历史问题”，这位商人却不在乎，对鲁说：“I know your story.”执意要雇他。他感谢这位老板的知遇之恩，便尽心尽力地工作。后来他与妻子都调到这家公司在浙江的部门，一直干到多维记者见到他的三天之前，他辞职回家来。

有人曾经劝他自立门户，鲁礼安却不愿考虑，他觉得自己在老板手下干得还算舒畅，更重要的，他总想着用更多时间和精力来读书、思考，反思那段刻骨铭心的“文革”岁月。他用近十年时间写出一本回忆录。正如江汉大学退休教授姜弘所说：“原来曾想，文化大革命是无法如实描述的，因为那一切太离谱，太不正常了，真实的不正常有可能成为漫画，使人感到荒诞。然而，读了鲁礼安的这本书，我改变了看法。……他不加矫饰地把当年那种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照原样再现出来了。”“鲁礼安给了我们一块‘文革’的活化石。”

鲁礼安现在是虔诚的基督徒——与他母亲一样。他为教会作词、谱曲、写文章，多维记者还读到了他写的一个儿童剧本《耶稣已经过来了！》。

◇ 附：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关于处理“北、决、扬”一案的请示报告

中共湖北省委：

关于“北、决、扬”一案，1974年3月省委决定交我院审理后，我们曾多次向省委汇报，一直未最后定案。去年5月省委常委再次讨论决定分别判处首犯鲁礼安、冯天艾无期徒刑，骨干分子蔡万宝、甘勇等有期徒刑。定于同年9月20日在武汉市召开公判大会，并向中央报送了备案报告。后来省委领导同志又指示，公判大会停开，此案暂不处理。最近，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及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中对反革命罪的规定，我们对此案又进行了复查，现报告如下：

一、立案与审查过程

此案发生于1967年11月，当时毛主席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发表了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指示。以华中工学院学生鲁礼安、冯天艾等为首，对抗毛主席指示，在社会上纠合成立“北斗星学会”，分裂群众，破坏联合，妄图搞乱武汉。在这种情况下，点名批判了他们。但是，他们改头换面，以鲁礼安为首成立了“武汉地区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即决派），并出版《扬子江评论》，发表有反动内容的文章，故1968年由省革委会政法组立案审查，经调查后作出审查报告。1969年8月以武汉军区党委的名义向中央写了请示报告。中共中央于1969年9月27日发了《对武汉问题的指示》的文件，指出：“‘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作的大杂烩”，《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并指出：“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国民党反革命将领干毅、老国民党特务周岳森等犯，必须立即逮捕，依法惩办”。对“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对“《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省革委会根据中央指示，逮捕了王盛荣、鲁礼安等13人，组织专案审查。经过审查，于1973年释放了周岳森。1974年3月此案交我院后，经批准又释放了田国汉、干毅、张志扬、王盛荣。周凝淳因患精神分裂症已保外就医，现尚有7人未

处理。

二、审理情况

我院受理此案后，经过反复审理和核实，并多次研究，我们认为此案在事实上有重大的变化。

1、幕后操纵问题不存在

原认定“北、决、扬”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现查明：周岳森是华中工学院附属中学的党支部书记，根本不是特务，只与鲁礼安有过一般接触，不是幕后操纵者。干毅系华中工学院教师，原系国民党将领，与鲁礼安等人没有接触过，仅因其子干小雄曾参加鲁礼安在华工组织的敢死队而怀疑干毅通过其子操纵“北、决、扬”。经查，所列线索纯属分析，不是事实。王盛荣仅与鲁礼安见过一次面，没有谈及“北、决、扬”的问题，不是幕后操纵者。上列三人均早已释放，故幕后操纵问题已不存在。

2、反动纲领认定的根据不足

经再次审查认为，从他们公开发表的“北斗星学会”宣言，还看不出有反动的内容。“决派”宣言，属于煽动极左思潮，鼓吹所谓“农运”，还不能认定为反革命纲领。原认定其有明显反动内容的（也就是有“三反对三重建”内容的）“决派”的宣言（草案），是鲁礼安起草的（现仅收集到打印件，没有原稿），未经“决派”开会通过，也未公开发表，故不能认定为该组织的反动纲领。

因此，“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

但是，鲁礼安、冯天艾等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极力推行他们的极左路线，纠合一伙人，成立“北斗星学会”，“决派”，出版《扬子江评论》，分裂群众，属于煽动极左思潮，做了一些危害党、国家和人民的坏事，主要是：

（1）支持、煽动农民进城，破坏工农业生产，破坏城乡社会秩序。

1967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下来后，鲁礼安等人错误地认为文化大革命运动最后要发展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农民运动已经成为当前湖北地区的主要矛盾。北京是学生运动的中心，上海是工人运动的中心，武汉将要成为农民运动的中心，因此，大肆进行活动，写什么《农民运动与知识分子道路》的文章，到农村去搞所谓农民运动的调查，炮制《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决派成立大会上宣读，宣扬现行反革命分子王仁舟搞的所谓“巴河一司新农村”的经验，支持王仁舟带领受蒙蔽的农民来武汉寻衅闹事，破坏社会秩序，破坏农村的大好形势，在湖北、武汉地区影响很坏。

（2）煽动所谓“反考”斗争，影射诽谤攻击周总理。

他们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及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思想的影响下，采用不指名的形式把周总理说成是什么“机会主义的中派”、“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二月逆流的总后台”。鲁礼安在《扬评》上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的反动文章，影射诽谤周总理，……妄图打倒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3）鼓吹极左思潮，破坏团结，制造分裂。

鲁礼安、冯天艾等人从1967年至1968年7月，编印《扬子江》及《扬子江评论》12期，大部分文章是打派仗，也发表了一些有反动内容的文章，大肆鼓吹极左思潮，煽动派性，制造分裂，对搞乱武汉起到了破坏作用。

三、处理意见

我们认为：鲁礼安、冯天艾等人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打着造反的旗号，干了一些坏事，犯有罪行，尽管他们的活动，偶尔也有过公开反对和批判张春桥的问题，但不能因此改变他们犯罪的主要事实，而在当时对他们进行拘留审查是正确的，必要的，对于安定湖北形势，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现审查结果，“北、决、扬”不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反革命组织。因此，此案不作反革命组织处理，按各人的具体罪行分别处理。鉴于这些被捕前大都是青年学生或工人（临时工），入狱十多年来，经过教育，大部分对自己的问题尚能认识，故予以从宽处理。对鲁礼安、冯天艾、蔡万宝、严琳免于刑事处分，对甘勇、童丹、马业成不以反革命论处，予以释放。有所在地法院和公安部门分别办理法律和释放手续。并本着“给出路”的政策精神，由其所在地劳动部门安排，在集体企事业单位工作。

以上报告妥否，请审批。

中国共产党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

1979年10月19日

（有删节。中共湖北省委于1979年12月4日对此报告批复“同意”。——多维编者）

□ 原载《多维月刊》

~~~~~

### 【书刊评论】

对于文革，真相比结论更重要

• 方 方 •

应该说，鲁礼安是文革中的特殊人物之一，因为他在这场浩荡的大革命中，不仅是追随，还有制造。他畅快淋漓的文章、唇枪舌剑的辩才、挥斥方遒的意气、侠肝义胆的豪情，曾经成为武汉三镇的传奇。正因为此，当传出他被抓获的消息，竟引发一场规模不小的“营救”运动。无论今天我们如何评价当年，无论事情的发生发展是对是错，对于鲁礼安而言，那都是他个人最轰轰烈烈也最风光无限的年月。

只是好景不长，鲁礼安最终被投入了牢房。虽然关他入狱的理由现在说起来像个笑话，但他却因为这个笑话，在不时转换但全部黑暗的小屋中度过了近十二年的时光。21岁到33岁，一个人几乎全部的青春都被永远尘封在此并且永远也索取不回。曾经与鲁礼安一起“革命”并也坐牢的诸多战友或死亡或崩溃，但鲁礼安却没有。这应该是个奇迹，连鲁礼安自己也认为是个奇迹。或许是他的充满自信的性格帮助了他。他在狱中一遍遍回忆自己的往事，以致那些事情烂熟于心，睁眼闭眼都清晰可见。那时候，他就下决心要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

这是一本重要的书，重要的不仅是内容本身，而是鲁礼安所做的这件事。十年的文革时间，实在是太漫长了，漫长得我们无法看清它的真相。随着二十八年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是非难分，越来越错综复杂。究竟是什么原因令中国产生如此之大的浩劫？是什么理由使中国精英们一夜之间以排山倒海的姿态崩溃？是什么力量让阳光一般的红卫兵突然成为人们眼里的恶魔？——这样的问题可以提出成百上千，但答案却总是吞吞吐吐含含糊糊。

当然，这样的问题，鲁礼安一个人的回忆录不可能解答，就算有其他更重要人的回忆录也无法解答，它需要千千万万过来人最真实的记忆。文革若是暗夜里的一块巨石，浑然不见它的真实面目，而鲁礼安的回忆录便是一只射向它的手电筒。虽然它只能让我们看到巨石的一个点，但如果有无数的鲁礼安将自己的文革经历写出来，尤其是那些在文革中身份地位相对特殊的人写出自己的文革历程，那么，这就如同手电筒从各个角度向这块看不清的巨石投射去光照。聚光之下，就算最本质的东西无法触及，但它的轮廓却已然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或许这样，我们方能以最快捷的方式接近真相。

其实，对于文革，我个人以为，真相比结论更重要。这就是三年前我非常希望看到回忆文革的原始文本的原因。

□ 摘自《一个人的文革史——〈仰天长啸〉序》

~~~~~

【读书笔记】

历史是宗教 写作是拯救
——读鲁礼安《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

• 胡 平 •

这是一本十分厚重的书：绝不仅仅是篇幅，六百多页，五十多万字，够厚重的了；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坐了十一年监狱——其间大部分时间还是单身监禁——的人，用了整整十年功夫写成的回忆录。这是用一生的心血，写下心血的一生。这个人就是这本书，这本书就是这个人。

鲁礼安是武汉人，原华中工学院学生，文革初期是武汉地区大名鼎鼎的革命小将，异端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1968年7月因莫须有的“恶毒攻击罪”被捕入狱，后来又因为涉及“反革命地下组织”案，差点被判死刑，被投入单人牢房长期关押，直到1979年才出狱。出狱后，作者用了整整十年功夫，写成了这本回忆录。这本书记载了作者的成长和经历，记载了作者在文革初期短短两年时间内的热情投入，指点江山，然后就是漫长的监狱生活，痛苦的思考与回忆，极度的空虚与绝望。通过这本书，我们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文化大革命，了解到一代造反派红卫兵的思想与心态，更可以了解到作者本人，了解到作者非凡的毅力、才华与品格。

◇ 单身监禁——难以描述的恐怖

读鲁礼安的书，最令人震撼的一点莫过于他十一年的单身监禁生活。这种痛苦远非笔墨可以描述，因为这种生活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没有生活。人是天生的群居动物，人必须生活在人群之间。人群之间就叫人间，在各种语言里，死亡都被委婉地叫做离别人间。可见人们都知道，离开了人群的生活就不再是人的生活。离开了人群，生有如死。作者引用恩格斯的话，单身监

禁是“野蛮得无以复加的刑罚”。单身监禁不仅对人的肉体造成极大的伤害，它更严重地摧残了人的精神和心智。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写过一部小说《象棋的故事》，其中的主人公B博士被纳粹单独拘押，在牢房里他面对的是一片虚无的空间与时间，生活成了空白，围绕他的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空虚。为了对抗孤独，B博士朗诵诗、背儿歌、背法典条文、演算算术……但问题是，就像他后来所说的，“在空虚中，我的记忆力什么也抓不住。我已不能把思想集中在任何事情上。”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时机他从狱卒那里偷来一本象棋棋谱，就像捞到一根救命稻草，拼命地读和背，不断地自己和自己下棋，一盘接一盘地发疯似地互相挑战，结果他的棋艺竟然高明到可以下赢世界冠军，但同时也陷入了精神错乱。

《象棋的故事》的中译本是在“四人帮”垮台后不久发表的，那时候，我们都刚从没有文化，没有书读的时代走出来，对极度的精神饥渴有很深的体验，所以对这部小说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小说毕竟是小说，小说有它的戏剧性和夸张性。真实的单人监禁要远比小说描绘得更恐怖。和鲁礼安同案的十几个人，最后有四个精神失常。

不止一位坐过牢的朋友告诉我，他们本来是一天能读一本大部头的书，下笔能写洋洋万言的长篇大论的，可是在长期的监狱生活、尤其是在长期的单身监禁之后，从此再也读不进大部头的书，写不了长篇大论。注意力很难集中在任何一件事上，平时总是心慌意乱，神思恍惚，心不在焉。由此我们也理解到，鲁礼安能够挺过十一年单人监禁而保持精神健全，又用十年的功夫写下这部五十余万字的回忆录，这是何等顽强的意志，何等卓越的才华，何等坚挺的自信！

为什么鲁礼安能挺过十一年单身监禁而保持精神健全，因为他给自己找到了一种自我拯救的方式：在被监禁的第八年的除夕之夜，鲁礼安向苍天和大地发下一个誓言：“我这辈子只要有一天能够走出这座人间地狱，我一定要把我狱中这段悲惨的经历写出来，我一定要揭露这桩钦定大案的真相。当然，我既不可能象《基督山恩仇记》里的基督山伯爵那样，去残酷地报复陷害我的仇人，也不会像《双城记》里的马奈特老人那样，去诅咒对我进行迫害的那些权贵们的子孙和他们家属中的所有。我只将如实地揭露迫害者本人的罪恶，用笔将他们这些自由和民主的敌人、扼杀人类道德和良知的刽子手，永远钉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果说对于我们中国人，历史是我们的宗教，那么，写作则是一种拯救。

◇ 文革活化石

鲁礼安是造反派。现在一提起造反派，许多人就以为他们都是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家伙，其实不然。例如鲁礼安，从小就是好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在运动初期，他对批判“三家村”和揪斗校长朱九思都是不以为然的。鲁礼安是从批评工作组而开始其造反生涯的，而他批评工作组也主要是出于对工作组整学生，把学生打成反革命、右派的不满，可见他的造反带有反对政治迫害的成分。鲁礼安后来成为红卫兵的理论家，他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宣言固然充斥着极左的词句，但其中仍然包含有反对官僚体制和向往民主的因素——尽管还是朦胧的、混乱的。

说来很有趣，鲁礼安的思想应该归为极左，但是它却引起了一批57年的右派的同情与共鸣。武汉地区不少57年的右派（如白桦、徐迟、姚雪垠等）利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机会介入造反有理的活动，他们对鲁礼安和他的《扬子江评论》与《北斗星学会宣言》尤其赞赏。江汉大学教授姜弘（57年右派）在给鲁礼安这本回忆录写的序言里指出，他和他的右派朋友们之所以赞赏鲁礼安，是因为“从他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那种青春的理想主义，洋溢的才华和初生之犊的勇气。

姜弘写道：鲁礼安们与众不同、难能可贵之处是，他们“因受压而反抗，而独立思考，从而冲破思想禁锢，从毛泽东走向马克思，反过来质疑现存制度，而且不顾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自己组织起来去探索新的革命之路——走向民主之路”。当然，姜弘也指出57年右派和文革造反派之间的重大区别：“一是性质不同，二是思想资源不同”。“右派是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主张而为毛泽东所不容，才‘因势利导，聚而歼之’的。造反派则不同，他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是被愚弄、利用之后又被抛起的牺牲品”。思想资源的不同，“主要是历史环境的不同造成的。右派的思想里不仅有社会民主主义，而且有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观念，这与他们早年所受的教育、所受五四精神的熏陶有关。造反派就没有这种精神资源，他们生长在严格封闭的单一思想文化环境中，所能接受的只有一种意识形态，就是‘毛主席的教导’”。需要提醒的是，鲁礼安们只是造反派中的少数。这是我们评价文革造反活动时不应该忘记的。

鲁礼安回忆录《仰天长啸》写得很真实。这大约也和作者长期与世隔绝有关。无怪乎有人要把这本书比作文革的活化石。认真研读这本书，对于我们了解文革，了解文革红卫兵一代，了解文革造反运动，了解文革异端思潮的来龙去脉，都有很大的价值。

□ 原载《北京之春》2006年5月号

~~~~~

#### 【研究述评】

往事还要再提——英文回忆录中的文革记忆一瞥

• 伍 国 •

近十年的英文出版物中，已经陆续出现了越来越多由海外中国人写作的关于六、七十年代生活的个人记忆，成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的一个途径，不少读物还在大学课堂上起着引导学生认识中国的作用。这是一段无法丢弃的岁月，但有时，个体记忆的喷发似乎也需要一定的机缘，不仅要有时间上的适当距离，也得有空间上的阻隔。在一个全然不同的时空中，本以为已经远去的记忆反而会变得更加真切，鲜活，撕扯着回忆者的内心，尤其当记忆与社会历史重叠，而且带有太多创痛的时候。但同时，这些记忆文字本身，也需要经受读者的评判。

在海外出版的英文文革回忆文字中，1987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署名“高原”的《自来红：文化革命记事》是面世较早也很受西方研究者重视的一部。1982年出国的高原，父亲是一位革命干部，陕西省某县领导，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高原的回忆详细地记述了家庭经历，自己从中学生到当红卫兵，破四旧，到北京参加毛主席接见，卷入派性斗争直到下乡的全过程。文革中中学生暴力化的心灵轨迹及环境的影响是我一直感兴趣的话题，高原的回忆在这方面提供了细致的记述。作者提到，在文革前夕的中学里，中学生就被要求一面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一面密切注意“阶级敌人”的动向，在这样的教育下，身边任何有嫌疑的人很容易成为假想敌。作者在这里没有进行分析，但暗示出红卫兵的偏激和暴力绝非一夜之间形成，而是和之前长期的教育和政治文化相关。在高原的老师中，有一位李老师在1949年以前有国民党背景，因此在文革爆发的时候理所当然地作为特务抓了出来。高原虽然喜欢李老师，但受的却是和“国民党反动派”不共戴天的教育，心理显然是矛盾的——“一想起这些事，我开始恨李老师，然而（内心的）另一部分还是喜欢他。”总体上，《自来红》一书的特点是，事实丰富而少分析和评论，也没有明显的感情色彩和倾向，即便在描述完自己亲身参与的破坏和迫害后，也似乎没有“忏悔”之情。这种手法，涉及到一切与文革相关的回忆录和自传体写作都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即着者究竟应该平实地叙述事实，还原历史，由读者来作出判断，还是应该直接加以评论？如果不加评论，是否会欠缺深度和分析？但如果加以评论的话，读者又如何

区分这些感想和评论是着者当时的观点，还是后来才有的“事后诸葛亮”的感想？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和文革的特殊性密切相关，因为文革是历史上少有的当时人人趋之若鹜，过后个个避之不及的事件。

华人女作家闵安琪（Anchee Min）的文革回忆录《红杜鹃》（Red Azalea）出版于1994年，曾是一部全美畅销书，还行销到全球二十多个国家，也是大学有关中国的课程的常用读物。作者闵安琪曾经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后在陈冲的帮助下赴美，初时不会讲一句英文，但历经打工，求学的磨练之后，用了八年时间用英文写成《红杜鹃》一书，记述自己的文革经历。书中的安琪出生在一个知识份子家庭，少年时为了自保，身不由己地参与了学校对老师的诬陷和批斗，在自己的父母受迫害后，于1975年下放到东海之滨的一个国营农场当知青。农场领导是一位铁姑娘似的人物“严”（音），安琪试图接近和引起“严”的注意，最终和“严”成为知己，然后发现“严”被压抑在不食人间烟火的外表下的旺盛情欲，同时也开始了自己的性觉醒。安琪充当了“严”和心上人秘密联系的信使，后来又在家中为二人充当红娘，促成天作之合。安琪对文革的认识，是一种在严酷的条件下对知青生活逐渐积累的绝望和反叛，其间对个体受压抑的感受甚至超过对物质匮乏的厌倦，她意识到，“我不属于自己”，声称，“我厌倦了生活，我痛恨做一颗枪膛里的子弹。”〔1〕当上海电影制片厂招收女演员出演样板电影《红杜鹃》的时候，安琪得以被选，但好容易快要成为明星的时候，主持样板电影的“旗手”垮台，安琪的明星梦破碎，成为电影厂的一名场记，直到赴美。这部书的女性视角，对被压抑的情欲的大胆描述恐怕是在西方引起广泛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道理和电影《菊豆》的成功类似。与高原的回忆相似的一点是，闵安琪的回忆也触及到了文革初期师生关系问题，并描述了自己被迫在批斗会上读“揭露”自己所爱戴的女老师“秋叶”的稿子后的矛盾和复杂心理。但闵安琪的写作在这一点上突破了高原的超然风格——她明确地提到自己内心的忏悔，并写自己二十多年后去请求这位老师的原谅——不幸（或幸运？）的是，“秋叶”老师已经不再记得她这个学生，甚至不再记得这件事情了。这一刻记忆似乎在和遗忘交锋，然而尴尬的始终是记忆，如同鲁迅笔下的《风筝》。

和《自来红》相比，闵安琪的书已经加入了个人情感和价值判断，对个体的人被异化为无生命的子弹或“螺丝钉”的尖锐揭示和本能反抗也是颇为惊心的。回忆录通过对话揭示出那个年代中的人不可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的困惑，以及个体和集体之间的对抗和个体意识的逐渐复苏。个体被吞噬，是不少文革回忆的共同主题。在美国女电视制片人，于北京长大的卡玛·欣顿（Karma Hinton）2003年出品的关于文革的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英文名Morning Sun）中，一位受访者指出，不可思议的红卫兵暴力的一大动因，就是为了获得被群体认同和接受的资格。卡玛·欣顿采访了李南央，刘亨，宋彬彬，骆小海，朱学勤，徐友渔等人。其中，李南央的回忆强调指出在当时的整个政治文化气氛下，“个人是庸俗的”，“自己”只是一个宏大的事业的一小部分。好几位讲述者都谈到人性价值观被否定，真实思想受到批判的问题，不断从不同角度回应闵安琪提出的问题，证明这不仅是个人记忆，还是群体记忆的一部分。更有意味的是，当年被御赐姓名的宋彬彬，在受访时回忆说，她当时并非自己主动接受了新名字，而是被报纸的报道强加的，宋彬彬甚至不无悲哀地说了一句，“名字不再属于我。”先不谈“宋要武”究竟是自己改的名字，还是被迫接受的，这里的问题是，观众知道李南央的话是现在对过去作的评判，但无法分清宋彬彬的这句话是在“回忆”当时的心理，还是在讲现在的感受，如果她在1966年就能够有“名字不再属于我”的清醒和无奈，文革恐怕就没有发生的理由和条件了。不过，整个采访过程中，其他人都在正常光照下，只有宋彬彬的脸部和骆小海一样，始终被处理在阴影中，尤其看不见眼睛。

然而，读《红杜鹃》的感觉，小说的成分多于回忆录的成分，作为作者的知己的“严”和另一为作为反面人物的女知青“陆”（音）占据了极大篇幅，整个知青生活似乎被简化为三人之间的纠葛，“农场”几乎成了一个太虚幻境，一些故事真伪难辨。此外，书中还有明显史实“硬

伤”：一方面，作者说自己1975年当知青，但在描述自己和“严”互相比赛背毛语录的时候，却提到其中一人说出“林副主席”在某一页说了什么什么；同时，作者说自己1976年初春到上影厂工作，后来的段落中又说厂里开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大会，其时周公已逝，当批“右倾翻案风”才对。西人为其情节吸引，固然无从分辨，但中国人读来，却有不严谨或信口开河之感。

闵安琪的回忆——姑且当做自传体小说来读——使人体体会到一种本能的反抗和一名女性拼命改变自己命运的冲动，而定居于英国的张戎女士的自传《鸿：三个中国女儿的故事》尽管出版时间——一九九一年——早于《红杜鹃》，却更多理性分析和思辨色彩，视角和思路也广阔得多。张戎在史实的严谨性方面比《红杜鹃》下的工夫显然也更大，不仅每一章都严格标明年代范围，且为了满足西方读者的需要，在叙述家史的时候，每讲到重大历史事件，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都详细地交代其背景，并加以评论，例如，“文化大革命不但无助于使中国文化中的中世纪成份变得现代，还在事实上使它们获得政治上的尊重。‘现代的’独裁和古代的不宽容彼此促进。”（2）

在我看来，张戎与《自来红》截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她在叙述的同时不断地加入评判，这些评论一方面使读者（主要是西方读者）对这段历史有一种更深入的了解，也明白作者本人的立场，但另一方面也使回忆录的客观叙事性受到影响。张戎描写道，她在被下放的四川德阳农村才看到了农民的真实生活状态，听到一位在大跃进时期的极左干部这样为自己辩解：他之所以无情地执行上级的命令是因为不愿意丢掉自己的位置——“生产队长是小，但至少他可以死在村里其他人后头。”（3）张戎作为知识青年在为农民办的文化补习班里读社论，但是她发现了其中严重的形式主义。农民因为读书无用看不到前途，已经对受教育根本不感兴趣，另外，一天的疲惫劳作之后，农民们一心想着家务，对听社论兴趣全无，但又不敢离开，只能在课堂上睡觉。事实上，高原的《自来红》也印证了这一点——高原描述下乡劳动的生活时说，“晚上我去参加村民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时候，几乎睁不开眼睛。”（4）在高原一笔带过的事，张戎则进一步剖析，由于缺少教育，村民的眼界变得非常狭窄，常常为饭里的红薯也可以吵上几个小时。张戎在描述自己仅凭一本《赤脚医生手册》就当上了“医生”的时候，也作出了评论：改善农村医疗条件不依靠建立更多的医院和训练更多的正规医生，而是靠“赤脚医生”，其结果使农村医疗条件更为恶化。闵安琪的回忆中，从未提到自己在文革中读过什么书，有何种对知识和理智的追求，而张戎则详细地讲述自己的读书生活——《鲁迅全集》，马列著作，以及其他一些从黑市上买来的书。她认为读马克思著作帮助她理性和分析地思考。由于读书和思考，张戎知道自己是个不太受村民欢迎的人。因为“干活是他们的全部生活，以及他们评价任何人的唯一标准。”（5）但是，细心而挑剔的读者（包括西方读者）仍可能追问，所有这些感受，比如对“赤脚医生”的评价，究竟是着者在多年以后写书时才认识到的，还是当时就意识到了？作为一个年轻的下乡知青，她可能有如此超越环境局限的思想和观点吗，是否有拔高自己之嫌？假如是写作时候的反思，那么对自传或回忆录来说，加入这些后来的判断又是否必要呢？回忆者，不论是宋彬彬还是张戎，看来在讲述的时候都有责任对当时的心理和现在的反思作出明确的区分。

无论如何，张戎的回忆中涉及到一件有意思的话题——知青和农民的关系。按她的讲述，她与农民之间最多只能说是相安无事，因为双方的思想感情实在存在巨大差异。而高原也在回忆录中承认自己根本不愿回到农村和农民一起干活。另一本英文的口述历史著作《把皇帝拉下马——一位中国乡村领导的画像》则难得地提供了同一时期农民对知青的看法，但同样地证实了双方的隔膜的确存在。《把皇帝拉下马》的受访者，河南省的一名村支书王福成（音）描述文革期间接待从安阳来的下乡知青的时候说，起初他作为村领导，为知青修了新房子，还打算开欢迎大会，后来听一些知青说要先打他一顿，再打城里的干部，就取消了欢迎大会。不久，村民就开始抱怨说知青光吃饭不干活，成天互相争吵，甚至打架。很多知青频繁返回城里，直到

最后全部离开。王福成说，“我们很高兴他们走了。他们是我们的负担。他们捣乱，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的，我一半的精力用来对付他们。在我当干部的这些年里，最失望的事情就是没有能让知青和村民统一”〔6〕王福成的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贫下中农”的态度姑且不论，农民和知青之间的思想感情差距太大看来是事实，双方的基本价值差异，交流障碍难以突破，“再教育”的宏旨从何谈起。

《把皇帝拉下马》在美国大学的中国历史课上是一本很受学生欢迎的书。这本口述史著作的作者 Peter J. Seybolt 是美国佛蒙特大学的中国历史教授，大概正是为了一反精英知识份子垄断历史书写，并以“事后诸葛亮”的评论来干预记忆的现象，特地选择了一位不识字的乡村干部王福成进行一生经历访谈。王福成 1954 年就已经成为他所在的村的党支部书记，一直任职到八十年代中期，其间经历了大跃进，文革，和改革开放。大跃进期间，他始终没有虚报过产量，文革中也没有迫害别人，相反受过一次批判，他参观大寨，但心里并不以为然，在回忆“批林批孔”的时候，王福成说自己起初以为“孔老二”是邻村的一个大地主，读来颇觉可爱。王福成的记忆和讲述是朴素的，他随遇而安，不痛苦，也不抱怨；他不质疑文革，但更拥护改革，他只是凭着基本的良心和适当的技巧生存，教育水平的限制无疑影响了对很多事的深入理解，但或许也使得他的回忆较少受到情绪和价值判断的影响。

王福成是幸福的，但是当亲历和回忆者并不具备支书王福成那样随遇而安的品性，相反却有强烈的文人氣的时候，其经历就令人叹惋了。著名英语文学专家巫宁坤的回忆录《一滴泪》有时几让人不忍卒读。巫宁坤也是在旅居美国的时候写作并于 1993 年在纽约以英文出版《一滴泪》。巫宁坤在序言中表明，他原本也是想避免提到这段经历的，但在子女和友人的坚持下，再加以相应的条件，才终于把记忆在异国释放和复制出来。巫宁坤把变成右派和受改造的过程以及其间的生活细节写得实在太详细了，而且颇多带怨气的议论，因此很惹得一些人不满意的。有一位也是著名的英语教授就曾在文章中不点名地批评他，意思是不能象其他某某名教授一样，以宽阔的胸襟来看待个人所受的委屈云云。这个批评显然还是沿袭了过去的思维，即个人的遭遇和痛苦在全体的面前还是微不足道的，没有资格表达的，可是联想到《八九点钟的太阳》中的受访者说的话，则这种对个体的压制，不正是当初文革爆发和暴行累累的根源吗？

巫宁坤的回忆录中的经历予人强烈的悲剧感。他自己钟爱莎士比亚悲剧，甚至在被放逐的兴凯湖边仍在吟诵《哈姆雷特》中的“丹麦是一座监狱”，思考丹麦王子的悲剧的实质，却不想自己早已经是现实中的悲剧角色。假如仍然沿用王国维关于三种悲剧：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的说法。于我看，巫宁坤一人独占了三项。迫害是一大社会悲剧，不遑多论。但他当初应赵萝蕤教授的邀请，尚未完成博士论文就匆匆从芝加哥大学回国，结果从此被错划，错打几十年却颇有命运弄人之感。当初李政道作为小学弟送巫宁坤归国，数十年后，功成名就的李政道来北京，住在北京饭店，巫宁坤往访，讲述了自己和其他一些学友的不幸经历，可接下来“……他（李政道）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和感情。他自信而有尊严地坐着，一看就是个标准的大学者，我很快就感觉到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7〕巫宁坤竟产生奇想，假如当年在 1951 年 7 月的旧金山，不是他送我，而是我送他……；这种戏剧性的人生只能说是命运的安排。巫宁坤生性爱直言，这已经足够铸就性格悲剧。回忆录中记述，他于五十年代初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翻译工作，看到一位领导人的讲稿觉得水平不高，立即发起牢骚来，而同为翻译的钱钟书马上作惊愕状，以手指置唇上作“嘘”声。这里的刻画极生动，性格差异及其所导致的不同人生轨迹此刻就已经注定，夫复何言。巫宁坤对监督改造时期的生活细节记录非常精细，实因这段日子太刻骨铭心。在“半步桥”劳教所，“每天吃两顿——窝窝头，玉米粥，一块很咸的大头菜。没有油，没有肉，没有蔬菜，没有糖，没有胆固醇之忧。”〔8〕后一句英文中连用五个 no，到了 no cholesterol worries 一语，始觉黑色幽默。读到巫宁坤在北大荒饿得浮肿将死，不知怎么又想到《我们仨》，想来那正是仨们大啖“高级饭”，“下馆子兼看戏”的时候呢。

书中的一个精妙处在对知识份子群像的描摩。巫宁坤写沈从文——“大师从来不谈他的困难，从来不发泄他的委屈，总是带着一副菩萨般的笑脸，好象他把个人的苦难视作理所当然，他把对生活的信心视作理所当然，所以他根本不去谈论它们。”〔9〕但是，当沈从文听说了巴金夫人萧珊1973年的去世，仍然悲痛无法自抑。巫宁坤对他所敬重的赵萝蕤教授，着墨甚多。我从这本书里，才知道赵萝蕤是赵紫宸的女儿。赵紫宸是我几年前在关于基督教新文化运动的硕士论文中曾经重点探究的一个人物，在此不妨稍提一下。赵紫宸（1888—1979），苏州人，1910年毕业于教会办的东吴大学，1913年成为专职神职人员，1913年赵紫宸赴美国田纳西州凡登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学神学，1917年获社会学硕士学位。新文化运动时期，赵紫宸等基督教“生命社”成员积极参与中国文化重建，并曾经与激进的陈独秀和胡适等人进行过一次无果而终的会谈。赵紫宸1926年至1952年间担任燕京大学神学院院长，是中国基督教实现本色化的重要领导人。赵紫宸一生试图调和中国文化和基督教，并调和自己的中国人和基督徒双重身分，主张以基督教作为中国社会重建的道德基础，并相信渐进改良的道路。在越来越激进的中国近代历史潮流中，赵紫宸的信仰和理想无疑已经是不合时宜的，他只能努力追赶变化的时代。爱国，然而不合时宜，从父亲赵紫宸的经历多多少少可以推知赵萝蕤的尴尬境遇。巫宁坤记述说，赵萝蕤在丈夫，考古学家陈梦家被打成右派后，就不幸患上精神分裂症，故未能在陈梦家第二次试图自杀（第一次吞服安眠药自杀未遂，十天后自缢）的时候阻止他。陈梦家在1966年9月3日去世的时候不满60岁。晚年的赵萝蕤膝下无子女，独自一人与古雅的明代家具和藏书为伴，藏书中包括最初版的亨利·詹姆斯小说和T. S. 艾略特签名的诗作。赵萝蕤唯一的消遣是弹钢琴，但在文革中原来那架“斯坦威”已被作为四旧没收。因为精神疾病，赵萝蕤必须服药，当巫宁坤劝她少服用时，赵立即变脸，说，“你想让我发病吗？”然而，和沈从文一样，赵萝蕤从来不叙说个人的伤痛，也不提自己的丈夫，巫宁坤特地写道。

读至此，我想，巫宁坤似乎也很钦佩历经劫难后倔强地保持沉默的人，但是他仍然突破对往事“从不提”的防线，把自己的伤痛说了出来，这也有宿命的味道——他直言，所以诉苦；但所受的苦本身也正是直言带来的。作为记忆的讲述者，巫宁坤和王福成不同，因为王福成的记忆始终是满足和愉快的，也和高原，张戎，闵安琪不同，后三者 in 文革爆发时只是学生，都是在出国后接受更高教育并且定居国外，而巫宁坤回国时就是教授，长期受监禁，写回忆录时已近暮年。“结论”可改，岁月已不可改。因此他的书的确是“怨”的，这或许也以价值判断影响了回忆的叙事客观性，然而他吃的苦毕竟是实实在在的，且始终不曾修炼到菩萨般的道行，要他“客观”，“乐观”甚或感恩戴德怕也难。这让我想起章诒和的一句话，“我想，能够悲伤也是一种权利”。假定赵萝蕤教授生前也有机会提起笔来调动自己的记忆，她的怨和怒，应该不会少于巫宁坤吧。

此外，还有一部在美国引起关注的文革回忆录，是不少国内读者熟知，1988年出版的《血色黄昏》的英译本“Blood Red Sunset”。这部著作的英文版由科罗拉多大学中国文学教授Howard Goldblatt（中文名葛浩文，翻译过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等书）翻译并于1996年出版。把《血色黄昏》译介到西方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由于这是中国人用中文写作的自传，从一开始就避免了用英文为西方读者写作时出于政治和市场考虑可能带来的干扰。在亚马逊网站上，一位美国读者这样评价《血色黄昏》：“……关于打人，虐待，谄媚和贪婪的故事充斥着每一页。对这一段时期实在没有什么好话可说。它令人浑身发冷。大约十年以前，我在中国现代史的本科课程上读过这本书。至今我还保留着它。”

革命伟人铮铮有言：“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然而记住过去未尝不意味着双倍的痛苦，遗忘也未尝不是幸运。对于往事，是选择遗忘，还是选择记忆，选择沉默，还是选择言说，或如那丹麦王子的独白：“默默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这真是一

个问题，而且，谁来说，说什么，也还是问题。文革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教育机会被剥夺的时代，然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却也是获得受教育权利的时代，对文革时期山东即墨县初等教育的普及成果，已经有中国大陆留美学者韩东平在2000年以英文出版了实证性的学术专著：《不为人知的文化革命：教育改革及其对中国农村发展的影响》，加以正面论述（10）。韩东平在佛蒙特大学师从《把皇帝拉下马》的作者Peter Seybolt教授，看来师生都倾向于对文革持一种温和的看法。如同书的前言中说，韩东平自己是在文革时期的农村受的初等教育，那么他站的角度和知青可以说刚好相反，也可以说，这是对个人记忆的一种学术性的论证，或者，是个人记忆催生了一部实证性的学术著作，而它展现了过去的文革研究和记忆中都避免提到的一个问题——政治上要彻底否定文革，但在具体的事情上，未必全部否定得了。这无疑提醒我们，尽管现在的这些回忆文字值得珍视，他们也并非全貌。所有的声音一齐高喊“我控诉”的时候，和所有声音高喊“就是好”的时候一样，仍然还是有人在沉默中压制自己的记忆。

（所有引文部分均由笔者翻译）

### 【注释】

- 1 Anchee Min, *Red Azalea* (New York: Penguin, 1994), 148。
- 2 Jung Chang, *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 (New York: Touchtone, 2003), 413。
- 3 Ibid., 418。
- 4 Gao Yuan, *Born Red: A Chronicl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342。
- 5 Chang, *Wild Swans*, 423。
- 6 Peter J. Seybolt, *Throwing Emperor from His Horse: Portrait of a Village Leader in China, 1923—1995*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74。
- 7 Wu Ningkun, *A Single Tear: A Family's Persecution, Love, and Endurance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The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93), 341。
- 8 Ibid., 75。
- 9 Ibid., 359。
- 10 Dongping Han, *The Unknown Cultural Revolution: Educational Reforms and their Impact on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2000)。

原标题为：《往事还要再提——英文回忆录中的文革记忆一瞥》

□ 原载《世纪中国》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xyz-info@cnd.org](mailto:hxy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